

趋市场化与去公益化：农村养老服务 社会组织的资源拼凑策略^{*}

赵晓峰 敖淑凤

提 要：在制度结构、同业竞争和居民需求所形塑的养老服务市场环境下，资源拼凑成为农村社会组织应对市场挤压、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的重要选择。“趋市场化”的运作以资源调动、关系转化以及跨边界行动等资源拼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村社会组织争取到了自下而上的行动空间，拓展了制度、社会与组织空间。然而，“趋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在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弹性的同时，也带来“去公益化”的组织发展风险，使得农村社会组织在市场逻辑与公益逻辑之间摇摆，加剧了组织发展的不稳定性，甚至遭到“合法性”质疑。对此，农村社会组织在吸纳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需要有选择地使用“拼凑”策略，将市场化的运作服务于公益性旨归，在专业的反身性实践中不断优化自我监督机制。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 资源拼凑 市场化运作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深受国家治理意愿和制度安排的影响，其规制性的特征构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外部结构性条件（王诗宗、宋程成，2013）。在早期的政社关系研究中，国家“支持”与社会组织“配合”被认为是政社互动的核心机制（唐文玉，2010）。随着社会治理转型的深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双向嵌入”与“双向赋权”等互动关系（纪莺莺，2017），并被视为政社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在保留对社会组织部分管控措施的同时，政府越来越多地以购买服务合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2ZDA101；主持人：赵晓峰）的阶段性成果。

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有形的支持手段激励社会组织发展，其中，服务采购合同已然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工具”（Zhang, 2015）。

在养老服务领域，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介入养老领域，通过购买养老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此过程中，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出日渐多元化的需求。而由于国家供给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兜底性等特征，其有限的服务类型也无法全面回应农村居民的养老服务需求，需要社会力量进一步补足。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中所具有的服务公共性、方式差异化、水平专业化等特点，使其成为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情境中，政府成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和制度来源（梁晨，2016）。在此环境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很大程度受到国家力量的影响，大量未发展成熟的农村社会组织依赖政府的资源支持，成为政府供给基础性养老服务的帮手。与此同时，在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市场企业力量也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挤压了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对此，一部分社会组织开始做出回应，主动减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积极对接养老服务市场，以既有资源拼凑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从理论层面看，学界研究长期以来主要讨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由“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逐渐转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机制，强调国家的主导地位。而单纯依靠国家机制难以对农村社会组织出现的资源拼凑行为进行有效解释，需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组织与市场间的互动。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就已兴起关于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讨论，相关研究对市场化的方法和价值观及其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讨论和反思。市场化可能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生存需求，但同时也可能损害非营利组织专业服务的能力，带来使命偏移、公共精神丧失、社会合法性危机等问题（Eikenberry & Kluver, 2004）。在国内，受到市场思维的启发，部分社会组织也开始尝试借鉴商业思维，对组织内部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进行创新，以期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和效率化运作。农村社会组织在经历内生性发展后，逐渐走出乡村并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服务领域之中。在面临制度结构、同业竞争和精细化需求的养老服务市场环境挤压下，社会组织如何与资源基础强大的市场企业进行竞争？在社会组织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公益为本和市场导向如何平衡？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社会组织与市场环境间的互动，关注市场挤压环境下

社会组织如何行动，以资源拼凑理论视角，对江苏省 Y 村 H 机构展开研究，剖析其选择转变自身发展思路的背后动因和过程机理，总结其拼凑过程中的资源管理方法与行动逻辑，并探讨在社会组织发展思路转变下所面临的合法性质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

对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沿着三种逻辑展开。一是国家治理逻辑。政府是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主要通过形式购买模式、定向委托模式、公开竞标模式及凭单购买模式购买社会组织的养老服务（李双全、张航空，2019）。政府分别从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制度执行环境三个维度激励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发挥着定盘把向、传导部署、细化落实的作用（姜耀辉，2023）。在“政府主导型嵌入”机制的形塑下，社会组织通过政策嵌入、关系网络嵌入和服务嵌入等途径进入养老服务体系之中（罗艳、刘杰，2019），而未能适恰的制度规范，则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面临制度困境的根源所在，需要从优化管制要素和内在文化—认知要素两个方面进行改善（李娟，2020）。二是社会服务逻辑。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整合资源、拓宽就业渠道、弥补服务供给不足等优势，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供养—连接型、供养型、连接型和不完全型四种介入式发展模式（吴翠萍，2017），但社会组织在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上也存在财力收入与支持有限、服务意识欠缺、人力专业化与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邵文娟，2019）。在农村养老服务领域中，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内生性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资源，以现代吸纳传统的方式重构农村社会资本，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难题的重要视角（双艳珍，2023）。三是政社合作逻辑。治理时代国家与社会的非对立性提供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互惠共赢的协同服务逻辑（双艳珍，2021），而在养老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却存在着因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非合作博弈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成本增加、效果欠佳等一系列问题（李娟、丁良超，2019）。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分工合作，是治理时代提高养老服务效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需要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深化改革的要求，构建“合作共治”型嵌入模式，实现善治理念下养老服务合作供给的协同增效目标。在此逻辑下，社会组织和政府

府间关系从“制度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走向“契约性嵌入”（李文祥、韦兵，2022）。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社会”视角，强调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行为的约束或赋能作用，承认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指明政社合作供给服务的必然路径。尽管政府对社会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既往研究普遍忽视了市场在社会组织发展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在论述过程中，资源对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关键作用被广泛认可，然而却缺乏从社会组织自主性逻辑透视资源问题的视角，过于强调资源的约束作用及社会组织对资源的依赖。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诸多启发。从现实实践看，一些走出农村并逐渐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实践案例表明，尽管面临资源限制的发展环境，社会组织依然具有承接项目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通常情况下，社会组织会极力调动并整合资源优势，而“拼凑”策略理论有助于帮助理解其中的行动逻辑。

（二）理论基础：资源拼凑理论

关于资源对于组织发展机会的作用，既往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型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较多关注市场中竞争者们所难以获得的独特异构资源。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组织与自身关系网络间的互动，也未能对组织的自主性能力与调节依赖性实践做出解释。基于既有研究，资源拼凑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资源环境分析范式以解释组织利用可用资源来识别机会、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

“拼凑”一词是指从碰巧可用的各种事物中构建或创作作品，资源拼凑则被定义为“通过应用手头资源的组合来凑合”（Baker & Reed, 2005），即组织积极采取行动，将手头已有的资源组合应用于新的问题与不确定性环境，而不是停留于是否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疑虑中。组织需要在资源要素的发现、整合和利用中，识别发展机会以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同时，在发展日常中注重资源的积累。资源拼凑涉及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可用资源，涉及社会组织内部无须搜索、社会交换即可以低成本获得的资源，关注已有资源的潜力；二是运用资源，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应对新的挑战并抓住新的机会；三是重组资源，根据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创造性地重建资源，以新颖的方式组合创造出新的资源序列（Liu et al., 2021）。

资源拼凑可以鼓励组织形成更加多样化的“机会集合”。由于拼凑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资源拼凑往往可能产生主观意想不到的、隐性的知识或异构的服务（Sun

et al., 2020)。例如,拼凑可能会带来对资源如何重新配置的主观看法,塑造组织独特的认知框架,进一步鼓励组织识别可以开发和利用并具有潜力的机会,从而催生出满足新市场需求的可能手段。另外,通过不同资源维度的拼凑组合,组织经历的转变过程可以使制度“偏差”正常化,使得重新利用的资源组合本身获得合法性,并可以成为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一部分(Desa, 2012)。虽然拼凑是一种在动荡环境中的适当行为,是能够克服资源限制的一种常见且通常广泛有效的方法,但它也可能会损害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企业广泛依赖拼凑行为也会阻碍其获得新资源,进而导致市场中断(Kickul et al., 2018)。并且也有学者观察到,拼凑一般只支持资源丰富组织的生长,而那些缺乏强大资源基础的组织则很难从拼凑中获益(Bojica et al., 2018)。所以,对于组织的资源拼凑行为,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在具体了解特定组织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拼凑的基础上,对其行为及结果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整体评估。

(三) 分析框架

在对组织资源拼凑行为进行研究时,由市场需求、机会竞争等组成的拼凑动机;由资金、团队与技能等组成的拼凑对象;由利用、排列、重组等组成的拼凑方式;由选择性拼凑和平行拼凑等组成的拼凑类型,都能够成为解释资源拼凑行为的重要分析单元。本研究聚焦于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资源拼凑,构建一条从发现资源、转化资源,再到组合资源为机会价值的路径,从市场挤压环境中获取发展空间。

社会组织资源拼凑行为的过程及效果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外部环境体现在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快速变化的不确定制度环境,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培育政策以及定向资源的持续变化,这些因素影响着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内部环境与社会组织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关,包括其建立的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关系网络等,影响着社会组织可获取资源的数量和类型。此外,社会组织自身性质决定了其发展结构与业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将其限定于特定的框架之中,这也影响着社会组织的可及性资源。

基于此,本研究着重从过程化视角进行分析。具体而言,首先对社会组织的资源拼凑行为进行识别,包含以下方面:(1)资源调动,当面临资源短缺或监管等限制时,社会组织拒绝受到限制(Di Domenico et al., 2010),而是积极调动已有资源采取行动,为既定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或完美的(Baker, 2007);(2)资源转化,在资源网络的联系中转化已有资源,包括社会组

织自身的时间、网络联系等，获取新发展机会，计划使用或已使用的资源或许是曾经以低成本或免费获得的（Baker & Reed, 2005）；（3）重新组合资源，社会组织采取措施重新分配、组合他们可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该资源可能最初并不是用于既定目标（Senyard et al., 2009）。其次，对社会组织的资源拼凑行为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案例具体深描社会组织资源拼凑的过程，探讨社会组织如何通过拼凑资源，应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市场挤压环境，归纳其资源拼凑的逻辑。最后，深入剖析其资源拼凑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从制度、社会与组织三个维度分层讨论。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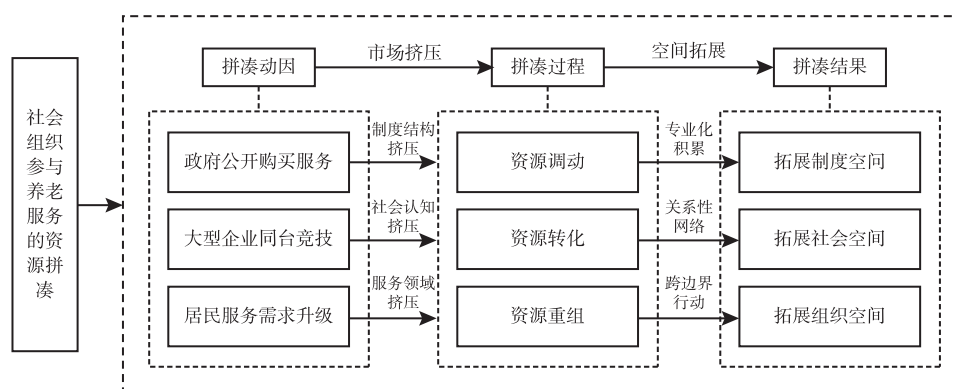


图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资源拼凑过程

三、研究方法

典型案例能够帮助我们透视宏观环境中现实生活的微观现象。本文从典型案例入手，关注 Y 村 H 机构在市场挤压环境下资源拼凑的动态过程，同时总结其纵向发展的历程，对该社会组织的发展及转向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总结性归纳。

（一）案例选择

依循案例选取的典型性、真实性、完整性及对研究者的启示性原则（殷，2004），本文选取 Y 村 H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H 机构）作为研究对象。H 机构是一家经 Z 市民政局注册的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依托 Y 村集体经济并顺应社区发展需求

而生，以养老服务为主业，在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特色养老等领域开展专业社工服务。H 机构在走出乡村发展壮大并遭遇市场挤压环境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H 机构在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中具有典型性，是分析资源拼凑策略的关键案例，与笔者的研究问题具有高度契合性，为笔者进行资源拼凑分析提供了独特样本。同时，该案例信息丰富、翔实、方便调研获取，为研究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和互证。从案例的推广意义上看，H 机构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在专业性人才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标准化服务体系愈加成熟，机构现有员工接近 200 人，社会工作者持证率达 90%。此外，H 机构还拥有 7 支为老服务志愿队伍，人数达 800 余人，先后承揽了 Z 市 9 个镇区的养老服务项目。自成立以来，H 机构先后荣获全国百强社工服务机构、S 市 4A 级社会组织、敬老文明号、养老服务先进集体、Z 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是国内目前发展较好的社会组织。剖析 H 机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拼凑行为和经历，可以为养老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思路。

（二）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收集案例资料：一是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对 H 机构的孵化者、管理者、兄弟组织以及所内生乡村的基层管理者等人员进行访谈，从不同立场与角度对 H 机构做出了解；二是参与式观察，笔者在 2023 年 6—8 月对 H 机构进行持续追踪期间，进入 H 机构的服务场域之中，对其开展服务的过程进行整体性观察，并与一线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进行交流，记录利益相关者对 H 机构的评价；三是文档材料收集，主要包括 H 机构的宣传册、Y 村内部报纸和网站报道等。下表展示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序号	受访者代号	所属机构	与 H 机构关系	职务/身份
1	D1	Y 村党委	管理者	党委书记
2	W1	Y 村党委/Y 村基金会	孵化者	党委委员、总干事
3	W2	Y 村基金会	孵化者	干事
4	H1	H 机构	运营者	总干事
5	H2	H 机构	运营者	副总干事
6	H3	H 机构	运营者	一线社工
7	T1	Y 村 L 机构	协助者/兄弟组织	总干事
8	T2	Y 村 G 机构	协助者/兄弟组织	总干事

续表

序号	受访者代号	所属机构	与 H 机构关系	职务/身份
9	T3	Y 村 S 机构	协助者/兄弟组织	总干事
10	J1	Y 村五老协会	志愿者	负责人
11	J2	Y 村舞蹈队	志愿者	队长
12	J3	Y 村	志愿者	党员、退役军人
13	F1	Y 村	服务对象	村民
14	F2	Y 村	服务对象	村民
15	F3	Y 村	服务对象	村民

(三) 案例介绍

H 机构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 “耕好一亩三分地”的初创期：2013—2015 年逐渐明确养老服务定位

H 机构萌发于 Y 村 2013 年的爱心互助街之中，最初以志愿服务为主开展阵地活动。2014 年 5 月，应 Y 村内部的社会服务需求，H 机构正式注册成立。H 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明晰的服务定位，而是包揽了 Y 村内部大部分的社会服务工作，既开展社区治理方面工作，也承接社区妇女、儿童、社区职工等人群的相关服务。在“一包揽”的情况持续了两年后，Y 村前任党委书记吴书记一方面出于服务专业化考虑，将 H 机构的服务剥离，使分工更明细，在此期间成立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Y 村村民的需求在同一阶段也在发生不断演变，多元化需求开始呈现，需要开展专项服务。至此，H 机构形成了清晰的服务定位，即聚焦于 Y 村的“一亩三分地”，做好村庄内部的养老服务工作，包括居家服务、社区阵地活动等，为村民提供专业服务。

2. “专业发展辐射周边”的成长期：2015—2018 年走出村庄拓展服务市场

H 机构正式注册成立后，在 Y 村开展养老服务的半年中服务成效凸显，赢得了服务对象的良好评价，打响了机构的口碑。同一时期，恰逢 Z 市发布了为老服务政策，提出要“所有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全面社会化运营”。基于 H 机构服务口碑的积累，镇政府主动找到 H 机构，希望其承接所处镇 12 个村社区的为老服务工作。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H 机构承接了所在镇村社区的阵地运营工作，并进一步承接了政府购买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工作。而后，H 机构的养老服务开始向周边的乡镇拓展，并逐步开始进入市区养老服务市场，在全市形成了 60 多个养老服务点位（社会化运营阵地）、承接了四个镇区的居家上门服务，并运营了一家养老院，实现

了“村—镇—市”的服务范围拓展，并在专业服务的不断积累中形成了“社区—居家—机构”闭环养老的服务模式。

3.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转型期：2018 年至今应对市场竞争的迭代重组

H 机构在接轨市场后，一线城市的大型养老企业同步进入 Z 市与社会组织进行养老服务项目竞争，H 机构面临跨地域竞争与外部市场力量的巨大冲击。虽然 H 机构在 Z 市本土属于资源基础较强、发展态势良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与外部养老企业庞大的资金、团队支撑相比，依然处于尴尬境地。在市场环境的冲击下，H 机构一方面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开始拓展、开辟新的发展方向，进入社会组织转型发展阶段。基于前期的服务市场积累，2018 年 6 月，H 机构发展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主管业务包括机构托管、长者养护、家政服务、管理咨询等。在同步开展 H 机构为老服务的同时，利用工商部门内注册的企业性质，开展一些低偿的自费服务，如居家上门专业护理、适老化改造等。依托 H 机构管理团队多年来对于养老产业的专业研究和实践，H 机构整合在地资源，发展社会企业并通过企业的低偿服务资源反哺社会组织，旨在将输血机制转变成造血机制，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运营模式，以此应对市场环境的挤压。

四、应对市场挤压的社会组织“资源拼凑”

在市场挤压环境下，面对外生资源的不足，社会组织围绕已有资源进行“拼凑”，通过专业化积累、关系性网络和跨边界行动，拓展组织生存空间，并迈向组织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这构成了社会组织“资源拼凑”的行动逻辑。

（一）资源调动：以专业化积累拓展制度空间

从宏观制度环境层面看，国家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为基本养老服务提供支持和帮助。社会组织在参与承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的同时，许多养老企业资本也逐渐注入进来。在这一阶段，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引导者与培育者的角色，它鼓励多元化的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市场，以公开竞争的项目购买方式获得更为专业、科学、高效的养老服务。政府采购养老服务项目愈加公开与透明，相对而言对于社会组织培育和孵化时期的倾向性支持逐渐减少。在公开的养老服务

市场中，社会组织发展较为“吃力”。

面对公开的养老服务市场与制度空间资源的限制，H机构以自身的专业资源积累为基础，通过两方面的行动拼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空间。

一方面，以规范的组织管理提升项目运作的专业性。H机构在正式注册成立后，形成了清晰的养老服务方向，以及固定的组织架构、服务场所与专业人员等。在规范的组织管理基础上，为满足政府服务外包在绩效和评估等方面的要求，H机构一是进行标准化的项目管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通过统一的管理流程、一致的沟通机制以及清晰的项目档案管理等，实现机构内部项目管理的标准化；二是进行公开化的信息管理，H机构定期将机构的年度报告、财务报表进行公开，捐助人及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机构刊物、公众号及网站对服务项目和机构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规范化的组织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业服务的质量，为机构积累了服务口碑，争取到一定的优先被选择权。H机构规范化的项目运作与当地政府的管理产生了相辅相成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层群众的多样养老服务需求，成为社会组织在公开市场中拓展制度空间的切口所在：

我们专业 OK 的话，那外来的组织就很难去入侵了，其实社工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自己的专业嘛，你的一个服务的品牌、服务的质量，其实关键就是甲方花同样的钱，也希望更加有优势的机构来运营。（访谈编号：T220230627）

另一方面，以职业化工作团队增强养老服务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实际操作者。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着社会的整体能力，影响着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效能。首先，H机构在人员筛选方面着重其专业性维度。H机构不仅在管理层形成了较强的专业认知和专业精神，并通过日常的管理渗透于组织团队。在人员招聘方面，“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一线工作经验”等方面也是考量的重要维度，通过专业人士的引入和专业的制度同构进一步促进机构的专业化。其次，H机构在员工的培养中注重日常的专业能力培训。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管理培训的社会组织通常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组织合理化（Hwang & Powell, 2009）。H机构会不定期邀请行业专家进行团队培训，使团队成员明晰自身的角色定位和专业职责。同时，一线社会工作者与督导之间的双向交流贯穿服务始终，保证及时的专业评估与反馈。最后，H机构在服务落地过程中秉持

专业方法和理念。凭借在 Z 市各个片区的服务经验和本土的内生优势，H 机构结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项目方案设计，机构副总干事为我们具体描述了这一过程：

比如说有创投项目出来了，乡镇提出他们的诉求之后，然后我可能会跟我们当地的一些区负责人，上门去做一些需求上面的沟通，确定我们项目服务的一个主题。（访谈编号：H220230626）

在服务过程中，H 机构进一步结合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个案工作等专业方法和优势视角、角色理论等专业理念，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切入点展开服务。

H 机构在公开的养老服务市场环境中，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能力，充分调动“手头”资源，在公开市场中采取积极行动，利用其专业性提高社会组织竞争力，其专业积累帮助机构拓展了一定的制度空间。

（二）资源转化：以关系性网络拓展社会空间

从中观社会认知层面看，组织规模与资质是建立社会认知与信任的初步门槛。在政府采购养老服务项目过程中，由于政府并非专业的服务机构，对参与购买养老服务项目的组织无法全面洞悉，通常采取综合评价标准。其中，组织业绩、组织规模、组织资质都成为进入服务项目“竞技场”的初步门槛。而同外部的大型养老企业相比较，社会组织在组织规模、资本支撑等方面往往与市场企业存在较大差距，这也使 H 机构在市场资质的内卷竞争中处于弱势。与此同时，外地评审专家与服务对象对于本土社会组织的不完全认知也让 H 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好多评审的专家，是从外地请过来的，有些专家只看方案，但方案的话其实有些东西在本地是做不了的，他们也不清楚。（访谈编号：H120230625）

面对大型养老服务企业的资质内卷与社会空间的资源限制，H 机构通过转化关系性网络资源，拼凑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间。

一是借助政治关系建立社会信任。H 机构是 Y 村内生的社会组织，注册资金由 Y 村支持，因此 Y 村担任着对 H 机构监督和指导的角色。借助 Y 村的行政资源，H 机构在争取服务资源的过程中更加容易获得外部政府的认可。Y 村党委领导也为 H

机构增加了组织的政治合法性。从 H 机构孵化者的话语中可以进一步佐证此观点：

对外的话，我们通过村党委，跟各级政府的这种衔接作用，然后可能帮他们争取一些外部的项目。（访谈编号：W120230814）

我们村党委的那个书记，他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全国最美退役军人代表，然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就是等同于市里的领导级别，通过他去跟政府那边更好对接项目的信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关键的人。（访谈编号：W220230626）

政治合法性提升了地方政府、居民对 H 机构的信任和认同，从而更容易接受其提供的服务。与 Y 村党委的友好关系不仅被 H 机构转化为了自身的良好声誉，还减少了市场挤压环境下社会组织自我发展面临的失败风险和成本损失。

二是借助业务关系改变社会认知。一方面，H 机构在落地服务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甲方的关系进入服务领域：

其实前期只能是依靠政府，比如说我们要进小学，我都不认识校长，这就需要依托政府关系，可能服务质量好，下次我们就可以直接对接上了。（访谈编号：H320230628）

依靠业务关系进场可以建立 H 机构在服务对象心中的初步认知。另一方面，既往合作的甲方对于 H 机构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组织知名度，通过服务满意度反馈与服务对象的“口耳相传”扩大影响：

他们村社区之间也会相互打听是吧，比如都说哪家做得好，那选择的时候肯定有些倾向性。（访谈编号：T220230627）

一旦被业务伙伴确认为“可靠的”社会组织，就潜在帮助组织获取了社会合法性，这形成 H 机构发展的战略资源。业务关系为社会组织提供了获得政府资源的机会，这些资源对 H 机构的发展是无价的，在建立社会对于 H 机构的认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信任、承诺、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机会识别率。

三是借助同源关系开发松散资源。H 机构与 Y 村的其他社会组织均是在村党委

与村基金会的孵化与支持中成长起来的，属于同源的兄弟组织关系。在发展过程中，H机构与兄弟组织在专业知识、地方资源和执行经验方面进行互补，更好地承接服务，如H机构副总干事所言：

就拿我们村的几家社会组织来说的话，比如说虽然说L机构他是做社区板块对吧，但也会有一些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然后都会有一些交叉和沟通，做服务的一个整合。（访谈编号：H220230626）

兄弟组织的网络关系为H机构提供了在公开市场中可能无法获得的重要市场信息，例如相关服务项目的细微变化、合作伙伴信息等，使H机构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发现新的机遇，从而有效盘活闲置资源，合理利用拼凑能力。而密切的互动也促进了兄弟组织之间优秀经验的学习和交流，从而在持续的交互过程中开发吸收松散资源的潜力，提高冗余资源的利用率。H机构的兄弟组织对此发表了相同的看法：

兄弟机构大家都知道，虽然说其实我们管理是分开的，但是我们协调事情的话很方便。（访谈：T320230627）

我们村内部也会召开一些联席会议，比如说几个社会组织这个月开展活动，那村里作为一个统筹的部门，会联合联动起来一起开展。（访谈编号：T120230627）

H机构在资质内卷的市场环境中，将政治关系、业务关系、同源关系等关系性网络，转化为社会组织当前所需资源，其关系网络帮助机构拓展了一定的社会空间。

（三）资源重组：以跨边界行动拓展组织空间

从微观服务层面看，Z市在家政养老等“日常所需”的基础之上，“医养结合”以及升级型的养老服务需求逐渐上升。与此同时，由于健康状况、经济水平、消费观念及城乡地域差异等，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老年人对于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也不尽相同，养老服务的供给难以采取固定的服务模式。随着养老服务诉求的愈加多元化，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领域中所对接的服务也愈加精细化。

组织边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中其他主体相区别、相连接的界线，却也构成了社会组织成长空间的限制性框架。面对养老服务市场逐渐升级的精细化服务需求与组织成长空间的资源限制，H机构通过跨边界行动重组已有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首先，跨越运营边界开辟社会组织新的发展方向。因应养老服务的产业化发展趋势，H机构着手业务转型，H机构总干事如是说：

用一些社会组织的情怀概念，去做这些服务其实并不合适，它其实是一个市场行为，所以这块也是一个转型的考虑。（访谈编号：H120230625）

2018年，H机构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以机构专业社工成员为班底，组成了颐养公司的“牌子”，同步开展H机构的为老服务工作。通过“挂新牌”的方式，H机构打破了固有的非营利公益属性对其运营行为的限制，借助社会企业迎合养老服务市场的需求，从而更好地调动机构员工的积极性。通过资源重组实现对社会组织市场机会的拓展，再生出新资源。

其次，跨越业务边界拓展社会组织新的业务市场。运营村社区养老服务阵地，以及承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项目，为H机构打开了基础养老服务的市场。在此基础上，H机构通过有效调用、组合已有专业养老服务资源，增添增值服务，形成了社会企业的养老服务清单。H机构副总干事对社会企业的业务市场做出了解释：

其实这个对象也是分两块，因为我们不是说是一家纯企业，也是一家社会企业，那这块的话，一块就是兜底服务对象，像按摩理疗什么的都是免费的，那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增值服务对象，会适当地收取一些费用。（访谈编号：H220230626）

通过业务边界的跨越打破社会组织固有服务内容的限制，拓展培育农村老年人的自费服务市场。

最后，跨越形象边界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反哺。H机构在运营和业务方面的跨边界行动，改变了既往由一线专业服务、服务环境和宣传公关等所形塑的社会组织刻板印象，进一步促进了H机构在形象边界上的跨越，H机构的服务对象如是说：

他们一些服务收取费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也是有成本的。（访谈编号：F120230815）

通过形象边界的跨越，H机构跨界运营社会企业的行为获得了服务对象的理解，这使得资源重组后的“新资源”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合法性，为H机构增添“新能源”，以此“养活”了部分专业服务项目。

在要求越来越高的精细化服务领域中，H机构通过打破社会组织发展的限制性框架，以跨越运营边界、业务边界、形象边界等跨界行为，将社会组织已有资源排列重组成促进机构发展的新资源。合理适度的“跨界行动”，是社会组织激活内部资源、拓展资源汲取途径的重要策略，帮助H机构拓展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五、去公益化发展？社会组织趋市场化的资源拼凑何以出现

H机构通过资源的调动、转化与重组，为其应对养老服务领域的市场环境挤压，打破资源限制性条件，构建了一个社会组织资源拼凑的行动逻辑。专业化积累的资源调动耦合了行政逻辑的治理目标，使社会组织在有限的制度空间中争取到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市场资源；关系性网络的资源转化对接了社会逻辑的群众需求，使社会组织争取到社会认知层面的服务对象资源；跨界行动的资源重组则在社会组织内部生成了市场逻辑，其以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为主要表现，借鉴企业管理的绩效成本、效率思维，对社会组织内部的人员管理和业务范围进行调整，从而突破社会组织边界的限制，使社会组织进一步打开了组织发展空间的“阀门”，接触到更多的市场资源。由此，在社会组织的资源拼凑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运营开始出现“趋市场化”的发展转向。那社会组织趋市场化资源拼凑行为的出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又是否应当去公益化发展？其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进行讨论。

（一）资源受限：农村社会组织去公益化

在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福利准市场化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迅速发展（向羽、张和清，2023），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将部分养老服务职能转移、

委托给社会力量，加快形成供给养老服务的社会合力。在此运作机制下，政府部门更多扮演资助方、规范方的角色，工作重心逐渐从生产养老服务转向监管养老服务。政府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公开的养老市场竞争环境，客观上提升了服务供给效率与品质，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却没有相应制度环境支撑其获取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一是资源获取存在一定的周期限制。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通常以一年为周期，社会组织需要持续地参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申报工作，一旦项目指标轮空，已开展的专业养老服务、人员工资发放、必要发展物资等将无法接续，其中存在项目周期化资源与养老服务长期化供给的巨大矛盾。二是资源分配在社会组织间呈现不均衡状态。目前各个地区都开展了对社会组织的等级评估工作，同一区域内基础条件较为完备、服务时间更长、社会知名度高的社会组织往往能够获得更高评价，这又使得养老服务项目与相关资源更进一步向其倾斜。三是社会组织行业内部资源短缺。养老服务领域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与资源，一方面，社会组织的行业发展空间不足以支撑组织所需的人才密集型发展，面临专业人才“招不起、留不住”的困境；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用于社会服务购买的项目资金量减少，与此同时，服务标准越来越严格，对于服务成本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以Z市的政府购买公益创投服务项目为例，早几年员工成本可以占到项目资金比例的60%，现在只能占到40%，而对于社会服务供给的质量并没有降低要求，且财务审计更加严格。如果不寻求政策上的“操作空间”，社会组织所能获取的财政资金十分有限，而寻求制度内的“操作空间”又会有打破社会组织的规范化运作的风险。

综上，社会组织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面临着资源获取限制、资源分配不均衡与行业内资源短缺的困境，制度环境的资源限制威胁到社会组织的生存，迫使其转向市场领域寻求资源的可操作空间，这也造成了社会组织在寻求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其发展方式不自觉或不可避免地“去公益化”。

（二）资源红利：农村社会组织趋市场化

社会组织在对接养老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养老市场中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同时看到了市场化运作方式所带来的巨大资源红利。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倾向于采取市场化的组织运作方式。H机构的资源拼凑行为就体现了其组织转型的市场化运作逻辑。一是组织管理的市场化，通过项目提成

的方式鼓励机构一线社会工作者争取项目，同时调动专业经验与社会网络，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提升社会组织运作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影响。二是服务内容的市场化。对于在养老服务市场中发现的不同社会需求，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供专业服务获取一定的市场资源，在这种市场思维的引导下，社会组织倾向于选择性地提供服务。三是服务供给的市场化。以专业服务“标价”的方式，增加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但不同于企业本身的商业交易，社会组织更多借助市场化运作模式获取资源，旨在为专业服务的发展创造空间。在市场的挤压和推动下，H机构复制成功的资源拼凑经验，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进行发展，不断承接养老服务项目，以保持机构的收支平衡，维持机构的有效运转。从2018年起，无论是机构人员数量，还是承接服务项目资金，每年都成倍数增长。从H机构的实践看，其趋市场化的资源拼凑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在限制性资源环境中的一种自律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补充资源以促进社会组织使命的实现。并且，其市场化的运作逻辑对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创新行动产生了有益影响。除此之外，学界既有研究也对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运作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例如，瓦切科娃等（2017）对捷克的研究评估表明，随着国家政治转型，市场化运作被视为转型社会中非政府组织从公共部门获得自主权的关键工具，帮助捷克非营利部门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并“发展其独特的制度特征”。综上，市场化运作有利于社会组织拓展资源来源、增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彼此的协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当前，市场逻辑在社会组织场域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在资源红利的引力下，社会组织趋向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三）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拉锯：社会组织的“合法性”

当前，市场主体的营利性与社会主体的公益性在养老服务市场中并存，而政府对养老服务市场的引导并未对二者之间的边界进行清晰界定。政府通过福利契约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符合治理目标，推动社会组织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合法性。而社会组织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影响下，呈现出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分化发展趋势（董慧娜，2023）。从短期影响看，资源拼凑所形成的市场化运作逻辑为社会组织带来了积极影响。H机构通过自身资源的调动、转化与组合，不仅发现了新的市场业务方向，同时开拓了机构发展空间，形成了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资源互补的发展效应，发挥了资源的最大价值。部分学者肯定了社会组织市场化运

作的必要性，这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种自治的方式，从而成长为能够与市场和国家相比较的成熟社会部门（Vaceková et al., 2017）。但从社会组织的长期发展看，市场化的运作逻辑在带来资源红利的同时，加剧了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H 机构在“摸着石头”应对市场挤压环境的过程中，外界市场不断冲击着 H 机构的专业服务方向与服务理念，更多时候，其运作已经脱离了社会的概念，而是以一种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进行发展。但从社会组织自身的性质来看，非营利性、独立性、公益性和志愿性构成了其基本特点，这使得社会组织在资源拼凑的过程中需要在尝试探索市场新的发展模式与维持专业性发展之间拉锯，加剧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不稳定性。

同时，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也遭到了“合法性”的质疑。西方学者指出了市场化运作可能对非营利组织的传统角色造成潜在危害。而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正是为避免这样的情况，通过提供专业服务来为老年人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满足他们的需求。但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则可能使其转变为社会产品提供者和资源追逐机器，减损最初的社会使命（Reypens et al., 2021）。那为何社会组织会出现趋市场化的资源拼凑行为？事实上，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下，市场逻辑因符合国家运用社会资源补充政府的福利责任和社会福利供给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获得了来自国家的制度性认可，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社会组织的市场化运作有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组织趋市场化的资源拼凑行为，更多地指向一种为了社会组织发展而争取资源的组织战略，是对制度环境做出的回应，而不是与公益使命相背离的行业道德问题。从 H 机构的发展案例中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其虽然在组织运作上采取了市场化的办法，但这一过程并未影响其服务社会的职责。社会组织对市场资源并未盲目追逐，而是对市场化趋向的副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拉锯中不断调试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从而在资源限制性环境中开创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基础，提供了与市场力量回旋的空间。那么，社会组织趋市场化的运作是否具有长期的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则受到国家养老服务供给策略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政策和资本为社会组织打造了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制度化环境，虽然社会组织通过采用不断发展的多方面资源战略，积极利用其他资金来源创造的机会和空间，但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Kang, 2019）。

六、结论与启示

资源拼凑最初被广泛用于新生企业的创业拼凑研究，也有学者将其用于解释社会企业的行为，指出其在社会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初创期以及在“混合型组织”行为中的适用性（刘蕾、吴欣同，2020）。本文将资源拼凑的概念引申至对社会组织行为的解释中。与发生在企业创业初期的资源拼凑行为不同，社会组织的资源拼凑行为，通常出现于有一定资源积累的组织发展阶段。从案例中可以发现，选择性地使用“拼凑”可以帮助社会组织在薄弱的制度环境中生存，通过参与拼凑活动应对社会服务领域的市场挤压环境。“拼凑”提供了一种绕过资源限制的替代方法，在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通过拼凑专业积累、关系网络等手头资源，突破环境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限制，适应服务市场进行社会组织的转型发展。资源拼凑理论还尤其适用于社会组织的跨边界发展行为，着重对“手头”资源进行重组与创新。资源拼凑为社会组织创造了一种组织弹性，帮助其在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中发展。

可以发现，资源拼凑的发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H 机构内生于 Y 村，Y 村不仅是一个伴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和边界的开放逐渐发展起来的超级村庄，其党委干部也有着较为先进的治理理念，在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下，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回应村庄内部的共性需求。这也使得 H 机构有着远超于其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先天资源条件基础，为本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样本。鉴于内生于 Y 村村庄经济与文化的特殊性，H 机构同其他农村社会组织的资源基础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推广。当然，H 机构的发展历程，依然为有一定资源基础和运营成熟的社会组织提供了一条应对市场挤压的路径，通过跨边界的组织行动、混合组织结构以及创办社会企业等新路径的尝试，在社会组织内部融合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凸显社会组织创新性尝试的社会价值，通过社会服务制度与公益性旨归的一致性过程将其转化为“合法”行动，以此解决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手段的冲突问题。而对于资源基础尚且不足的社会组织，在耦合行政逻辑争取相关资源，保证生存空间的基础上，也可以逐步积累如基金会、企业等市场合作伙伴。同时，在服务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的拓展奠定基础。此外，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其长久的发展都需要积极回应利益相关者对社会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质疑，保证社会组织行为的公开透明，在专业的反身性实践中不

断优化社会组织的自我监督机制。同时，政府也需要在对社会组织开展必要的引导和约束的前提下，进一步适应开放的社会情境，对社会组织拓展自主空间的行为持包容性态度，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活力。

参考文献：

- 董慧娜，2023，《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与公益伦理：中国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多重分析视角》，《社会建设》第1期。
- 纪莺莺，2017，《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第1期。
- 姜耀辉，2023，《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制度环境激励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社会保障评论》第2期。
- 李娟，2020，《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养老服务项目面临的制度困境——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娟、丁良超，2019，《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理论探索》第2期。
- 李双全、张航空，2019，《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典型模式、适用条件及潜在风险》，《江淮论坛》第6期。
- 李文祥、韦兵，2022，《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 梁晨，2016，《试探与博弈：权力让渡过程中的社会组织行动空间与边界——以A市某社会组织为例》，《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 刘蕾、吴欣同，2020，《“两块牌子”：社会企业的资源拼凑逻辑——对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双重回应》，《东南学术》第5期。
- 罗艳、刘杰，2019，《政府主导型嵌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转变研究——基于H市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经验分析》，《中国行政管理》第7期。
- 邵文娟，2019，《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7期。
- 双艳珍，2021，《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合作养老服务合力——基于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互信关系的视角》，《新视野》第6期。
- 2023，《重构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一个分析视角》，《理论学刊》第1期。
- 唐文玉，2010，《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王诗宗、宋程成，2013，《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吴翠萍，2017，《居家养老服务中社会组织的介入式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向羽、张和清，2023，《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的异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反思——以广东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易艳阳，2023，《社会组织跨界行动策略：实践逻辑、动因效用与风险防范——基于Z助残机构的案例考察》，《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

- 殷, 罗伯特·K. 2004,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 周海涛、李永贤、李虔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Baker, T. & E. N. Reed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
- Baker, T. 2007, “Resources in Play: Bricolage in the Toy Store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2(5).
- Bojica, A. M., J. M. Ruiz-Jiménez, J. A. Ruiz-Nava & M. M. Fuentes-Fuentes 2018, “Bricolage and Growth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sa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0(3).
- Desa, G. 2012,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s a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6(4).
- Di Domenico, M., H. Haugh & P. Tracey 2010, “Social Bricolage: Theorizing Social Value Creation in Social Enterpris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4).
- Eikenberry, A. M. & J. D. Kluver 2004, “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Civil Society at Risk?”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4(2).
- Hwang, H. & W. W. Powell 2009,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4(2).
- Kang, Y. 2019, “What Does China’s Twin-Pillared NGO Funding Game Entail?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creasing Isomorphism.” *Voluntas* 30(1).
- Kickul, J., M. Griffiths, S. Bacq & N. Garud 2018, “Catalyzing Social Innovation: Is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lways Good?”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0(3).
- Liu, Z., Y. Xiao., S. Jiang & S. Hu 2021, “Social Entrepreneurs’ Personal Network, Resource Bricolage and Relation Strength.” *Management Decision* 59(11).
- Reypens, L., B. Sophie & H. Milanov 2021, “Beyond Bricolage: Early-Stage Technology Venture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Resource-Scarce Contex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6(4).
- Senyard, J. M., T. Baker & P. Davidsson 2009,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owards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ing.” *Thin Walled Structures* 29(5).
- Sun, Y., S. Du & Y. Ding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ck Resources, Resource Bricolage,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Based on Resource Opportunity Perspective.” *Sustainability* 12(3).
- Vaceková, G., V. Valentinov & J. Nemec 2017, “Rethinking Nonprofit Commerci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Czech Republic.” *Springer US* 28(5).
- Zhang, Y. 2015, “Dependent Interdependence: The Complicated Dance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China.”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6(6).

作者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张书琬

variations in participation across class composition pattern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lass segregation in Shanghai's urban neighborhoods is low to moderate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index. (2) Higher middle-class concentration in neighborhoods enhances residents' cohesion and participation. (3) In neighborhoods with greater middle-class concentration, lower-class residents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than upper-middle-class residents, with a stronger link between social cohesion and neighborhood participation. Expand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rove neighborhood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 local governance.

The “Last Square Kilometer” of Daily Life Policies: A Case Study of Household Waste Sorting in CF Community *Fang Lijie & Ye Yijie* 52

Abstract: Inspired by Bourdieu's concept of “daily life practices”, this article defines community waste sorting policies as “daily life policies” aimed at creating lasting behavioral changes. It argues that implementing such policies entails multiple interactions between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stitutions. First, external institutions are initiated, often beginning with social mobilization. Second, external institutions become internalized as behavioral norms. Finally, external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r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ongoing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is process enables changes in daily life practices and allows for the consistent policy execution. This study uses a neighborhood's waste sorting policies as a case to illustrate this three-stage process. The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an independent social system underlies daily life practices. Thus, “society” functions not only as a tool for mobilizing policies but also as their core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waste sorting policies and to explore a typology for “daily life policies”.

Marketization and De-Philanthropization: Resource Bricolage Strategies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Elderly Care *Zhao Xiaofeng & Ao Shufeng* 70

Abstract: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competition, and demand, resource bricolage has become a key strategy for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address market pressures and expand their development. “Market-driven” strategies, such as resource mobilization,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ctions, have helpe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gain autonomy and expand their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spaces. While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flexibility, they also risk “de-philanthropization,” causing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vacillate between market and welfare logic, intensifying in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is,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must selectively employ “bricolage,” align market activities with philanthropic goals, and refine self-regulat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reflexive practice.

From Resistance to Adaptation: A Study of Patient Role Transition Among Anorexia Nervosa Patients *Sheng Zhiming & Song Yiqun* 91

Abstract: The role of the patient is not fixed but transforms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